

魏巍雄文传千古

□许建辉

魏巍先生是我由衷敬仰的老作家。他的散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上学时读过、背过，当老师时又无数次给学生们讲过。那质朴无华的语言中蕴含的道德精神高标宛若生命食粮，曾经同那些与它有着共同追求的文学作品一起，滋养过我们的青春，熔铸过我们的理想。这篇名作的底稿复制件连同《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3部长篇手稿以及其他一批物件，都是魏巍老人亲手交给我，由我接收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如今它们安然无恙，魏巍老人却再也见不到了。每忆及此，总是心潮翻卷，浮想联翩，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永远记得初次见到魏老的情景。那是在199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纪念大会，当年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以笔为枪拼着身家性命奔走呼号的老作家们能去的都去了，整个会场一片华发。作为被雪埋工作助手的我借光姚老，有幸目睹了那片璀璨无比的文曲星云。散会之后，魏巍老人用自己的“坐骑”顺路把姚老送回寓所。汽车停在复外大街22号大院门口，姚老下了车，魏老也下了车，两个人脸对脸笑谈了几句，然后互道珍重，握手告别。当时的魏老，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雪白的衬衣下摆装进笔挺的绿色军裤里，干净，利索，英武之气逼人。看着他刚毅的神情和矫健而快捷的步履，可以想见当年他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在冀中平原上横枪跃马冲锋陷阵的勃勃英姿，想见他在血火遍地的金剛山下蘸着心灵潮水抒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的一腔激情。

后来，我调入了文学馆，因而有了多次拜望魏老的机会。带一篮鲜花，捧一份祝福，满怀敬意叩开那扇常年虚掩的大门，走进那间见识过热闹也遭遇过冷清的客厅。客厅里永远是那样简朴那样纯净：一盆盛开的鲜花，一碟时兴的水果，两小一大三只用棉印花布遮掩起残破处的老式沙发。沙发正对着鲁迅先生的雕像，迎门墙上是魏老手书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老作家把如何他的志趣、他的信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全都光明磊落地摆放在这里了。置身其间，不由得人不想到那篇代表着代代人对于崇高道德的理解与追求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不由得人不追怀那些高扬着理想主义旗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间小客厅，一座大课堂，只要走进去，就会感到天高地阔感到胸怀宽广，感到思想被澄滤心胸被荡涤感到热血在沸腾情感在升华。

每次每次，魏老总是那么真诚，那么亲切。他会拉你坐到他身边，把糖果塞到你手里；他会指着助听器告诉你他的耳朵不好，提醒你说话大声点儿；他会用那双充满了慈爱的目光一直看着你，神情专注地听着你说话。他会像嘱咐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嘱咐你要爱国爱人民，嘱咐你要学习马列要追求真理要牢记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话不多，一般都是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可是当我告诉他文学

从解放区走入新中国，之前和之后都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革命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并不多见，魏巍便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首先是一名战士，然后才是一名作家，从他的革命经历和创作实践来看，的确如此。

真诚拥抱生活的写作态度

魏巍从17岁参加八路军115师军政干校起，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又任20世纪50年代3次奔赴朝鲜战场，第二次入朝曾在阵地上仅了一个月，睡觉地点最近距美军仅400米；20世纪60年代奔赴越南战场进行实地采访，见到了越南的最高军事领袖，也接触到普通的战士；20世纪80年代，为写《地球的红飘带》，他实地寻访长征路，第一次崑崙没有完成，第二次坚持寻访完毕；20世纪90年代，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遍访我国的各大油田，深入不毛之地的荒漠腹地，登上浩瀚海洋的钻井平台，为石油战线的工人鼓与呼，进行了一场“和平建设年代的歌”。

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使魏巍拥有了丰厚的创作素材，而这些素材不能生发为创作资源，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如何看待和处理生活和文学之间关系，他说：“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而且他认为，文学创作只能“有中生无”，而不能“无中生有”。“有”即广阔的现实生活，“无”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想象。为写好《东方》第25章“城市”，他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挂挂职车间党委副书记；为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社会历史巨变，他到华北农村合作社和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至于战斗场面、战斗人物，则来自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亲身感受。

除此之外，魏巍还非常重视采访。他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说：“深入的感受跟深入的采访也有关系。就拿在战士中的采访来说吧，你跟他们谈得深，你对他们了解得深，他们的气质、思想、感情，就会感染你，使你也深入到他们的情绪中。也就是说，使你感受得更深些。”魏巍本人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他在晋察冀边区曾经战斗生活过10年左右的时间，在解放大西北行动中指挥过剿匪战斗，本就具有的战士情怀和时代热情通过实地采访抗美援朝战士们

馆成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时，他却因为高兴而一改平日多听少说的习惯，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起了教育的责任，谈起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说“‘三好’德为先”，要教育孩子们明是非知荣辱懂谦廉讲诚信，他说青年是未来是希望“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我听着，情不自禁地为老人之忘我情怀而感动。都这把年纪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仍然是国家前途是民族命运是子孙万代的福祉。什么叫坚守信仰绝不动摇，什么叫勇于牺牲义无反顾，从魏老的身体力行中，我找到了滚滚红尘难掩其光辉的答案。

更难忘最后一次拜见魏老，那是带着单位里的几个年轻人去接收他的捐赠。路上堵车，我们抵达时已近正午。魏老早已让家人把东西收拾齐全，整整齐齐摆放在走廊里。军盔、军帽、采访笔记、小说手稿……老人一一点指着，手把手交给了我们。他的神情庄严而肃穆，仿佛在送心爱的女儿出嫁送远行的将士出征。我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贵重：《东方》从构思到出版历时20余载，《地球的红飘带》是他从17岁参军时就开始向往的题材，《火凤凰》是他古稀之年的力作，而《谁是最可爱的人》则是他一生的最大骄傲和光荣——毛泽东主席曾批示“印发全军”，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曾予以高度肯定……一生的心血结晶，一生的历史见证，可以说都在这里了。把它们全部拿出来，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该是这位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亲手为自己的革命生涯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吧？当我们满怀敬意离去时，老人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出客厅，从走廊墙壁的挂钩上慢慢取下帽子戴好，慢慢地提起手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走到大门口，这才停住脚步，握手送别……然后，慢慢举起右手挥动着，目送汽车远去。汽车就要转弯时，我回过头去，见老人仍然在大门口伫立着，像一尊雕塑般悄然不动。那一幅影像，深深镌进了我的记忆中。

大约是在魏老仙逝的那年春天，我曾受邀到河北大学去，与文学院的莘莘学子做了一次坦诚地交流。其间我提到了丁玲、刘白羽、臧克家、周而复、姚雪垠、叶君健等一大批我有幸熟识的老作家，我说我敬仰他们，因为他们共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无比热爱、无比忠诚。出于文人的良知，写作对于他们首先是一种责任——传承我中华文化、弘扬我中华美德、卫我中华、强我中华的责任。这种良知来自屈原，来自杜甫，来自“亘古男儿”陆放翁……责任在肩，纤笔在手，他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他们把“文以载道”当作了毕生的追求。这一切，是“左”是右是福是祸对于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他们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认定是自己应该去做的，因而至真至诚至情至义，因而心怀坦荡因而正大光明。

战士的时代之歌

——读魏巍作品札记 □张吉山

的英雄事迹而被得以激发和高扬。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部集子中，作者融具体的史实、饱满的诗情、高昂的政论于一炉，真实展现了二战之后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场国际战争，热情赞美了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强权入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关注时代

魏巍作为一名战士作家，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关注时代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从他的两篇日记中可以充分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刚刚建立，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成为当时的重大事件，“祖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抗美援朝”、“赶走美帝国主义”等等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语言当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但在当时恰恰是一种“日常叙事”，是时代的流行语，也是魏巍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另一篇日记记于同年的11月2日：“以后又谈自己想做个缝上衣，我忽然想起他们政委也是爱谈笔、笔等，使我一下想起许多事情。我们的干部不是不好，但还有不少干部精神境界有些不广阔。钢笔、手枪、衣被等等成为谈话内容。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应当改善的。”时代的政治激情和战争文化共同铸就了魏巍对理想和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净化。

优秀的作家总能将自己的精神追求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20世纪40年代的《黎明风景》，20世纪50年代的《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前进吧，祖国！》《这里是今天的东方》等系列通讯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井冈山漫游》《广平的夜》等作品回响着时代的强音，洋溢着震撼人心的革命激情，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不怕艰难困

经典作家

他们为自己的追求奋斗了一生，最后又不约而同把自己身后的所有都捐给了国家留给了后人……或许是因为我讲的这些七七八八难登正规课堂的缘故吧，学子们因为初次听因而都听得非常认真。从他们明亮的目光中，我读出了疑惑，也读出了理解；读出了思考，更读出了感动。很想把这一切都告诉魏老，相信他听说后一定会十分高兴。谁知没等到我再去看他，魏老竟就去了。本想送给老人的一份安慰，却从此变成了我心中一份永存的遗憾。

2008年8月30日，是送别魏老的日子。天还没亮，雨就来了，开始淅淅沥沥，后来刷刷啦啦。到9点钟，突然就瓢泼似的一阵，同时还远远地滚过几声闷雷。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雨水在窗玻璃上哗哗流淌，我想天也有情，天也在哭。家人用手机从殡仪馆发回现场报告，说八宝山的兰厅外，人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多，穿军装的是有组织而来，但更多的是自行赶来的老百姓，是魏老的普通读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们。每一把小小的雨伞下，都站着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在这一刻都成了朋友，大家相聚拢来，一起为魏老送行。9点整，人群变成了秩序井然的两队，向着告别厅缓缓行进。一幅黑布挽幛高高挂起，“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倔强地挣扎在烟雨空濛中。

我知道，我该去送老人的，但我竟没有去，不是因为下雨，也不是因为从顺义到石景山之间横亘着的那几十公里路程，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再去亲证老人一去不返的现实，不愿也不敢再去听那令人心碎的哀乐。就在老人鹤归的次日上午，单位里派人吊唁，本没有安排我去，但我执意跟着去了。走进西山八大处那所绿树掩映的院落，只见满眼旧物依然，惟独不见了那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帧遗像披了黑纱挂在客厅北墙上，触景生情，心里不觉蓦然一颤：老人走了，再也不回头了！人民军队痛失了一名伟大的战士！中国文坛痛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我，则失去了一位从红领巾时代就敬重就尊崇的人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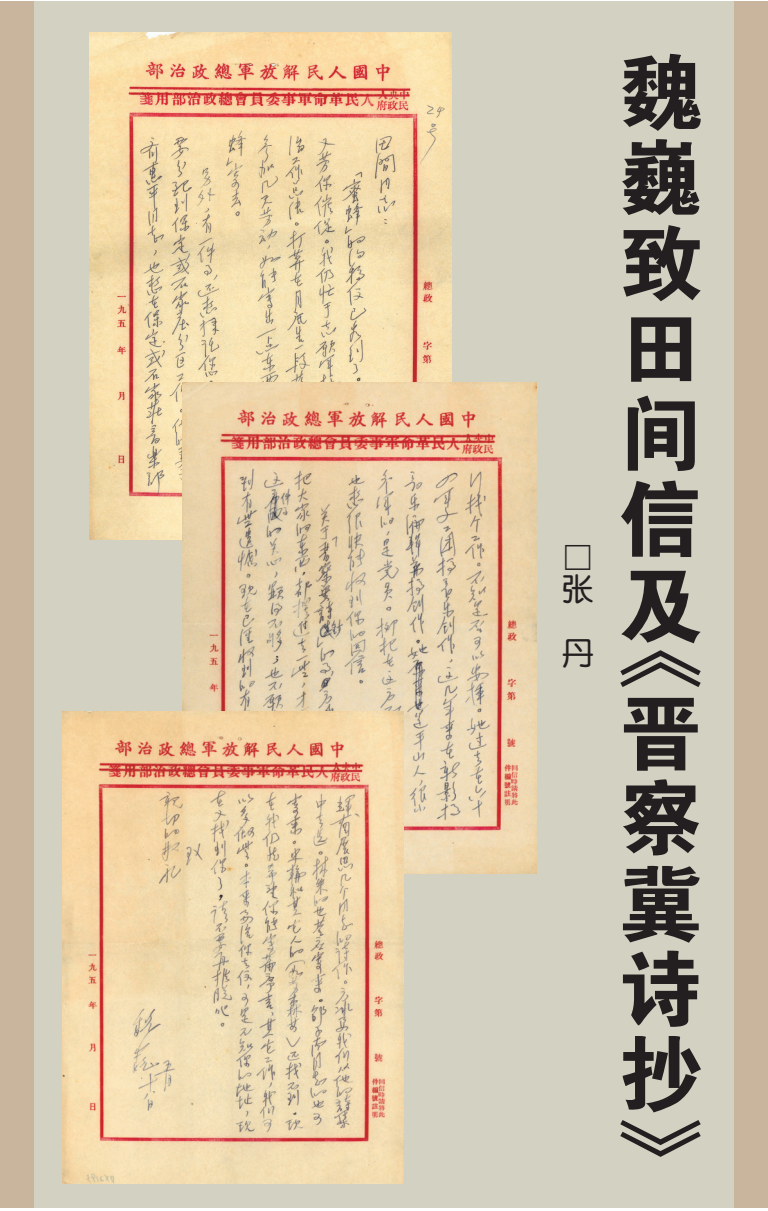
如今，魏老赐赠我的墨宝就挂在我的寓所里，上面“登高望远”几个大字，是嘱托，更是希望。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那次如沐春风般的谈话，想起老人对我面对面的谆谆教诲：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坚定信仰，相信党有清除自身疮疖的勇气和智慧，相信前途一定光明……而他对于文学馆的所有捐赠则均已记入国家的文物账目，珍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中。《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等手稿，是魏老挥洒毕生的才情与汗水，用华夏文字为中国革命建造的丰碑。呕心沥血的劳作中，他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名字也镌刻在了上面。丰碑不倒，“魏巍”长存，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劲，人家谈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本还没有感受呢，那就不用说了。”10年之后，魏巍在广州军区的一次文艺讲座上做了题为《我的文艺信条》，依然主张“写自己感动的东西”。

魏巍的散文之所以感人，除了作品内容、人物本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外，作者因受感动而饱含的激情以与读者互动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宣泄出来，运用排比修辞以增强感情抒发的力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身为作家的丁玲对魏巍作品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而且同钻进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因此，他所歌颂的人，就非常清晰、亲切地贴在人心上，使人兴起，使人上进，使人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一步，向着这些最可爱的人靠近。”

阅读魏巍的散文的过程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作者、读者三方在共同弹奏一曲多声部的“复调”过程，是三方共同完成文本的再创作过程。如果说魏巍散文的重要美学特征是鲜明的倾向性的话，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东方》则体现了作家可贵的艺术探索和大胆的艺术突破。小说开头主人公郭祥的出场便可谓匠心独运，作者非常巧妙地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郭祥和另外一篇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焊接在一起，这种二度虚构的手法，既强化了《小兵张嘎》中嘎子的真实性，也丰富了《东方》中郭祥的传奇性，两个人物的“穿越”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审美感受，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本呼应扩大了彼此的叙述空间。

小说另外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彭总的刻画和塑造，则既还原了历史真实，给读者以身临其境重回现场的历史感，也适当加以虚构，不拔高、不虚美，使人物形象变得亲切饱满，宛如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在湘军当兵，有一次派我当侦探，被抓住了，刑法很厉害，有一次实在受不了了，想承认，可是第二天又坚持起来，到底让我挺住了，最后闹了个取保释放。”小说中彭总对郭祥的谈话，是非常巧妙而大胆的，既体现了彭总的谦虚坦诚，也一改以往写英雄便毫无缺点的呆板平面，更隐含了革命家和作者对生命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



魏巍致田间信及《晋察冀诗抄》

□张丹

魏巍与田间，诗友兼战友。深厚的友情，始于1930年代中期。那时魏巍才十五六岁，在中原大地却已小有诗名。其诗友周启祥从上海抱回一大摞诗集，臧克家的《烙印》《运河》《罪孽的黑手》，田间的《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等都在其中。魏巍把每一本都“如饥似渴地读了”，尤为喜欢的是田间“独创的新体”，“诗句以短句组成”。“田间”这个名字，从此铭记不忘。心怡已久，终于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得以相识。那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线回到延安，正在“抗大”学习的魏巍得到消息，便迫不及待地跑去拜访，在西战团的临时驻地西北旅社受到了田间、邵子南两位诗人的亲切接待。一见如故，遂成良友。

1938年年底，魏巍“抗大”毕业，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恰好田间等也随“西战团”同期前往，几位朋友不期而遇战地重逢。延安的诗人把延安的诗风带到了晋察冀，田间、邵子南等放下背包就以“战地社”名义搞起了街头诗。晋察冀军分区分区“铁流社”积极配合，青年诗人们纷纷响应，魏巍更是热情高涨诗兴勃发。他随部队四处征战，走到哪里就把诗写到哪里。每到一个新的村庄驻扎，他都要“仔细观察，哪些墙壁适于写诗，就利用老百姓锅底刮下的锅灰制成土墨汁，用麻刷子蘸着，登在高凳上忘情地写起来”。1939年5月，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在晋察冀边区的东线打了一场有名的大仗——大龙华歼灭战，全歼日军桑木师团的一个中队，打死敌人400余名，缴获大量机密文件。为庆祝胜利，“战地社”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诗传单。诗歌写在红红绿绿的纸上，由欢迎凯旋的群众分发到战士手中，为胜利的欢悦又增添了几分喜庆。为了扶植在抗敌斗争最前线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青年诗人，“战地社”创刊了《诗建设》，先后由田间和邵子南担任主编。那是一本油印诗刊，开始是32开本，后来又扩为16开本。除刊登诗歌作品外，每期都会有一篇诗歌评论成为其亮点。刊物的最大特色是没有门户之见，所以能按各种风格的诗人都团结在一起，从而“培养了、锻炼了一大批富有战斗力的诗人”。

从1939年到1942年，魏巍在战斗的间隙中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大部分都刊登在《诗建设》和“铁流社”主编的《诗战线》上。全国解放以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要编一本《晋察冀诗抄》，把众多富有生命力的诗作集中起来，把这个伟大时代活生生的脚步作为艺术形象留下来，作为我们子孙不朽的纪念”。只是由于工作太忙分身无术，他的这个心愿直到1950年代后期才得以付诸实施。在写给田间的一封信中，他专门谈到了“诗抄”的编辑工作进程，同时很诚挚地敦请田间为该书作序：

田间同志：

《蜜蜂》的约稿信已看到了，因没有回信，又劳你催促。我仍在忙于志愿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总结。打算在月底告一段落，去十三陵参加几天劳动，如能写出一点东西，一定给《蜜蜂》寄去。

另外有一件事，还想拜托您。柳杞同志将要分配到保定或石家庄分区工作。他的妻子齐惠平同志，也想在保定或石家庄音乐部门找个作。不知是否可以安插。她过去在六十四军文工团搞音乐创作，这几年来在新影搞音乐编辑兼搞创作，她是平山人，很少参军的，是党员。柳杞在这方面很着意。我也想很快能收到他的回信。

关于《晋察冀诗抄》的事，方冰、丹辉都认为人多些，把大家的東西都摆进去一些，才更有意义。你对这件事的关心，显得不够，也不愿写序言，我感到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收到的有曼晴、徐明、丹辉、商展恩几个同志的诗作，方冰要我们从他的诗集中去选。林采的也答应寄来。邵子南同志的也可寄来。史轮和其它人的（如劳森等）还找不到。现在我们仍然希望您能写篇序言。其它工作，我们可以多做些。本来要给你去信，可是不知你的地址，现在又找到你了。请不要再推托吧。

致亲切的敬礼。

魏 巍
五月十八日

依信文分析，这封信应该写于1958年。两三年前，魏巍曾再返滹沱河两岸农村深入生活，以为创作长篇《东方》做准备。故地重游，情不可抑，《晋察冀诗抄》的编选，遂终于由“想”而成“做”——联系诗友收集资料的工作，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到写信时已基本齐备。又几个月后——1958年12月31日，魏巍作《〈晋察冀诗抄〉序》，宣告编选工作竣工。1959年3月，《晋察冀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4年又增编再版。书中有诗200首，除12首民歌外，188首为信中提到的曼晴、徐明、丹辉、方冰等38位诗人所作。这些作者中，有不少人是新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的著名作家、诗人，如孙犁、田间、魏巍、管桦等等。编辑中再读战友们的诗作，当年情景如现眼前，他为晋察冀诗诗歌战线的成就而自豪。

正是出于这种难得的亲密情感，魏巍在田间逝世后写诗送别：“诗人乘风归去，鼓声留在人间。延河今日呜咽，北岳热泪潜潜……”又在田间九十诞辰时，偕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诸友发起隆重纪念。在他心目中，田间“是晋察冀壮丽诗群的领军人物”，他“最终实地刻苦地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路线”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进行了开拓”。也是因为这种难得的亲密情感，田间生前一直宝藏着魏巍写给他的信，直到去世后由家人捐赠给了国家。这封信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最为珍贵藏品之一。